

# 編後語

發生在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轉眼百年。連同「二月革命」，這兩場革命不單結束沙皇的專制統治，直接導致蘇聯的建立，也影響日後世界與中國的命運。一如其他重大事件，「十月革命」總是在釐清史實和不斷詮釋中獲取它的合法性與當代意義。本期共有五篇專文，分別從歷史、政治、藝術等領域反思百年前這起改變二十世紀人類生活的關鍵事件。

「二十一世紀評論」刊文兩篇。秦暉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對觀，糾正一直以來貶「二月」、重「十月」的偏差，指出「十月」事件基本上是「二月」以來革命憲政進程的延續，而真正的革命其實發生在翌年的一月（俄曆）。事實上，對1917年兩個革命的解讀，會隨着歷史境遇和詮釋者的轉變而展現不同面貌。崔之元從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共和主義」視角解讀「蘇維埃」，而1970年代以後「共和主義」在西方的復興是將阿倫特提出的「由革命進程本身構建和組織的新的公共空間」與列寧「由所有的人輪流行使」管理權力的理念聯繫起來，藉以揭示這種超越代議制民主和極權主義的制度創新潛力。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國人對「十月革命」最概括的認識，卻掩蓋了許多曲折，「學術論文」欄目袁偉時和王柯的文章重析「十月革命」與中國的關係。袁文旨在清理「十月革命」在中國的遺產，指出俄共在一戰後轉身關注東方，冀圖通過顛覆殖民體系，消滅資本主義，建立自己的安全屏障。中國成為它的首要目標。共產主義的三大信條長期導致中共困頓，直到改革開放迎來轉機，開創新局，但至關重要的公民自由權尚在纏鬥，有待後來者努力。王柯則考察「十月革命」在中國的接受史，認為對中國社會發生實際影響應在1920年之後，帶來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布爾什維克主義。他發現，當時關注俄國革命的中國知識份子大多留日，而他們又是引介日本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媒介，由此，理清民族主義思想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二者之間的親和性，不難看出近代中國政治通過一條甚麼樣的管道消化了自身的社會文化傳統，從而理解中國近代政治進程的性質。

為紀念「十月革命」百年，世界各地推出不同形式的展覽。周密在「景觀」欄目為讀者介紹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大型回顧展「革命的衝動：俄國先鋒派的崛起」（“A Revolutionary Impulse: The Rise of the Russian Avant-Garde”）。透過油畫、版畫、字體設計、書籍、攝影、電影和物品設計等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媒介，全面展示俄國先鋒派藝術家如何融合「成為生活的藝術」和「作為抵抗的形式」這兩種美學旨趣，彰顯了先鋒派的藝術的自律性和文化的先導性，充分傳達作品的批判精神。

最後，懷着沉重的心情向大家報告，本刊編委、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園先生於今年4月辭世，我們特別刊出金耀基的悼念文，追憶兩人幾近半世紀的情誼。